

“君有敬通、孝标之恨”

——滕固之死

石建邦

当钱锺书得知滕固的噩耗，非常惊诧伤痛，一连写了四首五言古诗《哀若渠》哀悼。第一首即为滕固之死大抱冤屈，对他的死表示百思不得其解，他特别在此诗下面加了一条附注：“君有敬通、孝标之恨，遂促天年。”

滕固（1901—1941），字若渠，上海宝山月浦人。在民国文化史上，他无疑是一位多面手，既是小说家，又是中国美术史的开拓者；他又积极从政，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，还当过国立艺专校长。综其一生，他在文学创作、文艺批评、美术史、艺术考古、文物古迹保护乃至学术译介等方面均有卓越的贡献。

然而天妒英才，滕固中年弃世，只活了四十岁，令人痛惜。长期以来，大家对他的逝世原因不甚了了。笔者兹不揣鄙陋，依据目前所见资料，试对滕固之死及其身后琐事做一粗略梳理，求教于诸位方家。

1940年10月25日，滕固和徐梵澄到重庆化龙桥往访好友朱偰，“十年不见，灯前夜话，弥觉多情”。他们三位还有冯至、蒋复璁、姚从吾，在1930年前后都是一起留学德国柏林的老友。

老朋友战乱中重逢无话不谈。朱偰好摄影，拿出曩年在柏林为滕固外国女友所摄的照片，“桃李争放，倩影窈窕”。滕固看了心头别有一番滋味，“欣然以喜，怆然以悲”。感触之余，他当场题写两首绝句，内有“桃花人面春颜色，幻作弥天劫火红”“画图人物俱无恙，回首清游已十年”等句（朱偰《天风海涛楼札记》第九卷《人海沧桑》，页165，中华书局，2009年）。当晚，大家意犹未尽，滕固和徐梵澄两人索性留宿在朱偰家里。

当时，滕固刚刚从昆明回到重庆，辞去当了两年多的国立艺专校长的职务，仍然回行政院当参事，并到中央大学等学校兼课，讲授古代艺术课程。那段时间，他和好友常任侠、蒋复璁、金毓黻等人来往频繁，还预备改组中国艺术史学会，他的其他社会职务也复不少。

孰料刚过了一个月，滕固即开始发病。11月26日，朱偰从成都出差回来。午后去看他，却发现滕固“卧斗室中，辗转床第，汗出如渑”。朱偰和他略谈几句就匆匆告辞。

朱偰刚走不久，行政院同事陈克文就接到蒋复璁的电话，说滕固得了急病。他与同事端木恺

急忙赶到滕固家中，“奔走了大半天，才把他送到武汉疗养院去”（《陈克文日记》，页644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4年）。开始医生还以为是急性胃病，结果日益不见好转，于是转到中央医院诊治。12月11日下午，陈克文等人前往医院探视，医生又说是肺内积水，“情势殊觉不轻”。

整个冬春之交，滕固缠绵病榻。据好友章克标回忆，寒假期间，他的儿子滕留寅还曾去医院陪护了十多天。此时医院诊断下来，说他患肋膜炎和脊髓炎，经常需要抽水。“直至开春尚不见好转。”（章克标《世纪挥手》，海天出版社，1999年）

1941年的3、4月间，滕固的病情时好时坏，经常出入医院。4月11日，他给中央大学教务处写了张请假条，说他患疟疾正在医治，需要请假二天。15日，金毓黻去中央医院探视傅斯年，顺便又问起滕固的病情，说已经出院了。

但到5月15日，滕固写了封信给常任侠，托他主持召开中国艺术史学会理事会议，商量改组事宜，此信是目前所见滕固最后手迹。估计当时前后，滕固再次住院。5月19日，滕固好友体育教育家郝更生去医院探视。这次医院认为他得的是脑膜炎，怕引起传染，将郝拒之门外。滕固在里面门缝中见到郝，挥手遥呼：“脑膜炎！脑膜炎！”第二天早上七时三十分，滕固逝世于重庆中央医院，年仅四十岁。

滕固的英年早逝令众多知交好友扼腕叹息，但大家对他的死因却往往语焉不详，似乎不愿多提。好友朱偰《吊若渠》一文中约略说起：“国难以后，转徙流难，若渠扬鞭夜郎，余则随校如蜀迁居昆明，音讯仍通。余方喜其获展所学，作育多士，乃以若渠擅长社交之故，蜚语横生，家庭之间，颇多齟齬，若渠乃辞职归渝。……”虽含糊其辞，但似若有所指。

钱锺书和滕固在昆明相识，虽然只有短短八个月时间，但两人一见如故，可谓惺惺相惜。钱锺书的早年名文《中国诗与中国画》，就是受滕固的提示和邀约

而撰写的。当钱锺书得知滕固的噩耗，非常惊诧伤痛，一连写了四首五言古诗《哀若渠》哀悼。第一首即为滕固之死大抱冤屈，对他的死表示百思不得其解，有“子寿诂止此，止此宁天怪？”“徒令后死者，叩天讼其冤”（收入《槐聚诗存》）等令人锥心的句子。钱氏特别在此诗下面加了一条附注：“君有敬通、孝标之恨，遂促天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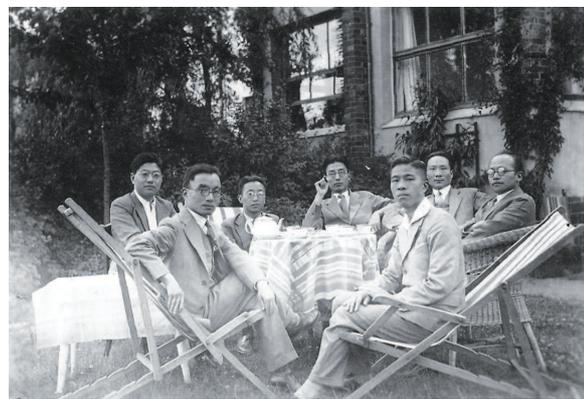
美术史家阮璞（1918—2000）是当年国立艺专的学生，他在晚年看到钱锺书的这首挽诗，引发无限共鸣，为此专门写了一篇《滕固老师的生平恨事》回忆解释。阮文说，钱诗中的这条自注，看起来隐晦，却将滕固死因一语道破。什么是“有敬通、孝标之恨”呢？敬通是东汉时的才士冯衍，字敬通，娶妻悍忌，备受折磨，忍耐到老，始得离异。到了六朝梁时，又有个文人刘峻，字孝标，在婚配上也与冯衍有相同的遭遇，在所撰《自序》一文中，他将自己与冯衍进行了比较，说：“敬通有忌妻，至于身操井臼。余有悍室，亦令家道坎坷。”阮璞作为学生，对校长的死痛心疾首：“这两位古人犹得抱恨到老，而滕先生的衔恨弃世，却在盛年。”（阮璞《滕固老师的生平恨事》，收入《烽火艺程——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友回忆录》，页36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，1998年）

据阮璞回忆，他1939年8月从国立艺专毕业，在1940年至1941年期间，常驻留重庆，故对校长滕固的情况有所了解。原来他在读书时，认识国立艺专总务处一位职员程先生。那时这位程先生年约五十开外，鬓发斑白，很是和蔼热情。程先生可能与滕固有些旧关系，当滕固卸任回到重庆时，这位程先生也随同前来。在滕固生病住院期间，程先生经常抽空往返于滕宅和医院，滕固去世时，也是由他帮同料理后事。丧事办完后不久，阮璞碰见程先生，他说起滕先生临死时的凄惨情形。其中最使阮璞听了感到难过的，是滕固的衣物都被他的夫人扣留，连死后入殓的服饰也不给。这种难堪，确实是令人难以想象的。

文中还说，阮璞在重庆曾和



▶德国柏林友人聚会。左起：冯至、朱自清、陈忠寰、徐梵澄、朱偰、滕固、蒋复璁。摄于爱西卡卜冯至住处花园，1932年6月14日



同学一起拜访过滕校长，但见他“神情显得有些沮丧，面容也变得苍老了许多”。在他看来，“事业上的心力交瘁，肌体上的病魔困扰，家庭生活上的饱受凌虐，造成了滕先生中年弃世”。

其实在当时，滕固惧内，滕夫人太过凶悍，在友朋中几乎是公开的秘密。

话说滕固也确实有点多情浪漫。但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偏偏碰到克星，怕老婆怕得要命，以至于不敢留任何异性的书信“罪证”在身边，不是销毁就是托知友保存。

滕固在当国立艺专校长期间闹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婚外恋爱。对象不是别人，乃是当时非常活跃的女诗人徐芳（1912—2008）。徐芳为人活泼健谈，同样擅长社交，魅力无限。据说当时很多名人对这位女诗人倾慕备至，但傲娇的徐芳小姐当时心里只有她的老师胡适，曾对胡适先生展开大胆追求。这段恋爱故事的具体详情，可参见蔡登山《师生之情难“扔了”？——胡适未完成的恋曲》一文（载《万象》，2006年6月号）。

1938年5月间，情伤失恋的徐芳心灰意冷，来到汉口，在艺文研究会从事写作。当时滕固还在国民政府的行政院任参事，由于战事吃紧，行政院准备从武汉内迁到重庆，故而经常来往于武汉和重庆之间。他与参事陈克文为同事，两人友谊深厚。

6月13日，滕固得到教育部任命，聘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，不久将赴湘西沅陵履新。17日，张道藩和端木恺设午宴为滕固送行，陈克文也在座，“客人有陈立夫部长、顾毓琇次长、梁实秋、徐芳小姐、杨秀娟小姐、莫小姐、罗君强及孔小姐。饭后，小姐们各以方言读诗，徐小姐之北平话，杨小姐之苏州话，莫小姐之上海话，孔小姐之广州话，均各有风趣。”（《陈克文日记》，页228）

这大概是滕固与徐芳在武汉的第一次见面，他们以前可能就认识，徐芳的毕业论文《中国新诗史》，滕固当年就审阅过，还留有签名。

滕固在武汉一直待到24

日，才启程去长沙。他在长沙停留了四天，徐芳也去了长沙，滕固对她极为倾心，还把此事写信报告好友陈克文（沈宁编著《滕固年谱长编》，页443，上海书画出版社，2019年）。

6月29日，滕固到沅陵国立艺专，正式到任，并开始着手整顿校务。一个多月后的7月31日，徐芳离开武汉，张道藩、端木恺、陈克文等人为她设宴饯行。她一路转辗，大概在当年9、10月间到达昆明，并在云南大学谋得教职。

就在当年11月，长沙发生大火，战火日益蔓延，至12月中下旬，滕固率领艺专师生分批从沅陵启程，一路迁移至贵阳，最后到达云南昆明。1939年2月底，全体师生分批抵达昆明，并开始复课。当时的昆明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，像西南联大等众多文化院校和学术机构都迁移到这里，一时成为文人学者、青年学生的聚集地，气氛热闹活跃。不消说，如此合适的氛围，也为滕固和徐芳的恋爱发展提供了温床。

滕固在昆明和吴宓等学界文人交往频密。吴宓是“爱情至上”主义者，当时正想重新追求毛彦文，苦于无人为他指点迷津，排忧解难。正好碰到滕固，于是经常向他问计。滕固则好为人师，大大咧咧当起他的“情感专家”来。于是两人经常碰面，吴宓更充当他徐芳两人的信使。

滕固和徐芳的恋爱，虽然今天留下的都是各种碎片，但足以勾勒出一个卿卿我我的大概。比如下面这首滕固的五言诗《翠湖》，写于1939年9月1日，从中即可窥斑见豹：

经岁结绸缪，寸心忻有託。
平生慕慷慨，汝亦重然诺。
今夕何夕乎？凉凄凄帷幕。
低眉似有恨，酬对言落落。
问汝何愁闷，问汝何思索。
侧身久无语，我心如焚灼。
移时拂袖出，苍莽步林壑。
执手始为言，肺腑吐盘错。
众口但悠悠，炎凉难忖度。
讥嘲噂沓来，令我心情恶。
我亦血肉躯，焉能常示弱。
好胜激所取，是非良凿凿。
忧忿易伤人，汝怀且宽拓。
蟋蟀撼不已，大树无损削。
前哲不我欺，